

“九一八”之后陈寅恪等人的抗日救亡立场

——民国报章中的往事

周运
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陈寅恪受到很大刺激，因而积极参与相关的抗日救亡活动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一日，即1931年9月19日，胡适在日记中写：“今早知道昨夜十点，日本军队袭击沈阳，占领全城。中国军队不曾抵抗。午刻见《晨报》号外，证实此事。中日战后，至今快四十年了，依然是这一个国家，事事落在人后，怎能不受人侵略！”他当日为陈寅恪嘱题一诗，其中有：“毕竟天难补，滔滔四十春。”（《题唐景崧先生遗墨》）陈9月23日函谢：“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，至今日仅赢得一‘不抵抗主义’。诵尊作既竟，不知涕泗之何从也。”（《胡适日记全集》第六册，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2004年；另见《陈寅恪集·书信集》）
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陈寅恪受到很大刺激，因而积极参与相关的抗日救亡活动。

提出对日经济封锁

9月20日，中研院史语所全体同人会议决定致函蔡元培、杨铨：“先生在中央提议，对日绝交宣战，自己振作，方可博得世界之同情，……所谓无抵抗主义者，自失人格，谁来拯救？”会议决议案的第四项是：“请蔡先生向中央建议：一、请政府与人民在同一立场上对付日本……三、请政府积极备战，不可永不抵抗。”他们先发了电报，等21日抄完信并准备签名时得知蔡去了广东，所以考虑是否写这封信。陈寅恪9月22日签注的意见是：“时局已与会议时稍不同，而蔡先生又赴粤，故当时所拟稿不甚适用，姑俟时局之推移如有我辈能尽一分之责处，再请蔡先生建议可也。前信似可不发。都签可缓发。”傅斯年他们也都同意缓发，结果最后就没发。（《傅斯年遗札》第一卷，“中研院”史语所，2011年）随后傅斯年又组织史语所编写了《东北史纲》，反驳日本关于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，而且为了供国联调查团阅读参考，还专门出了英文节本由顾维钧给国

联寄去。

《北平晨报》1931年10月16日在《北晨学园》刊发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等合写的长文《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》，文章前有吴其昌给编辑瞿冰淼的信：

冰淼兄，我们七人签名，合作一篇文章，前次先生已经知道了的。因为里面有个曲折，所以到今天才拿来，请原谅。望在《北晨学园》发表，具名的是：陈寅恪，傅斯年，顾颉刚，黄子通，蒋廷黻，冯友兰，吴其昌（以签字先后为顺序）。弟其昌顿首。十月十四日。

这篇长文有五千余字，提倡“今日生存自卫工具对日武力经济封锁政策，即可整个借用当日对英武力经济封锁政策之办法，但易二年为二十年耳”。其办法是十四条，其中第二条是：“（二）此政策，以绝对‘坚壁清野’为原则，凡：贩卖日货之商人，二、为日工厂工作者，三、在中国境内接济日人粮食者，四、在中国境内受日人雇用，及雇用日人者，五、乘坐日人所办之火车轮船者，六、在中国境内，与日人在一切任何性质之贸易者（如医院、照相馆、娱乐场、饮食店等），七、入日本在华学校肄业者，一律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，由民众团体治以极刑罪。”认为如果按此办法严厉执行，“则不特此次对日胜利，而自甲午以来四十年之国仇至此一雪，南京政府之基础亦可以万年不拔矣”。（全文见《傅斯年文集》第六卷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年）这项武力对日经济封锁的主张是非常激进的，也引起了读者的热烈讨论。该报10月20日刊发《关于〈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〉》，第一条是丁乾斋10月16日《致陈傅顾诸先生信》，提出作者们应该做一篇简明宣言，并约同道作发起人，请本市民众团体为发起团体，开大会，设永久机关来彻底施行，方有大功告成之日。否则只在报纸发表一篇文章，以为了事，则负此良策。

《北平晨报》10月22日刊出蒋廷黻《经济绝交的根本办法》，卷首有编者瞿冰



↑ 陈寅恪



↑ 蔡元培



← 蒋廷黻



↓ 傅斯年



↓ 顾颉刚

淼的按语：

自从陈寅恪、顾颉刚、蒋廷黻等七位先生发表了《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》以后，很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，有许多人写信来问对日经济绝交的具体办法。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实际的经验，原来自他回国任南开大学教授时，适日本强占济南，天津反日会办理经济绝交，蒋先生对此拟有极切实之办法。简单说，经济绝交不在单纯的抵制日货，而在夺取日货在华的市场。……此文系十月九日蒋先生在清华大学所讲。

早在1927年，时在南开任教的蒋廷黻就做过演讲，其中说庚子之变，列强之所以没有瓜分中国，是因为人民还有国家主义的精神，所以外人不

敢下手瓜分。“又如最近之国民党，在广州极力宣传排英，结果是香港变成了一荒岛。英国商业在中国南部的势力，大受打击。其实英国对国民党，要是用武力，很可以战胜，但他不能用，因为他也看出了这是中国国家主义精神的表示，这也是对外的。”（《国家主义之真意义》，乐永庆记，记录稿分两次刊载于天津《大公报》1927年11月4日与5日）蒋廷黻把自己的想法在《对日经济封锁》一文里进行了贯彻。

另外，蒋廷黻在1937年6月8日写给胡适信中曾回顾说：“国内讲抗日者奢谈民众力量，这是最不可靠的了。我还记得日本炮击山海关的时候，北平的学生曾要求校长担保生命的安全。此外华北走

私，冀东自治等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为外人奔走，与外人合伙呢？我们知识阶级，统治阶级的人，既没有为民众谋福利，任他们继续过他们的牛马生活，我们那可以把对外作战的重担加在他们身上？如果全国合作，人人埋头苦干，卅年后再谈作战还不迟。……在我这四十多岁之中，憾事虽多，其最大者即‘九一八’以前我当局及人民对东北问题的态度错了。我的胆子不够，未曾努力纠正当时的错误。假使努力而无成，我的良心还过得去。民十七，我在东北考察了一个月……彼时我觉得我国在东北的主权虽不完整，大致我们尚可有为，且自然趋势有利于我。在那种状况之下，我们应该忍耐，应该避免冲突。等到关内能给东北强有力的援助的时候再与日本算账不迟。民十九年冬，我在北大讲演的时候，曾表示此意，学生亦不反对，可见那时尚可以理喻。那时我们如果与币原[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]合作，我们的损失不知可减少到什么程度。”（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第三十九册）而《对日经济封锁》一文最后提及广州时代，因为全国民众热烈真切的拥护，因而国民政府对英经济封锁取得成功，所以“今日之南京政府，一部分民众已远离之，此实无可讳言”，这部分应该主要是蒋的主张，而胡适明显对他们文章提出的对日经济封锁主张不赞成，认为偏左。尽管不赞成对日经济封锁，而胡适也不再购买日货，可是还出现了谣言：胡适在访美期间，曾在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上误买日货：“临走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有些用处，要买一个小镜子，所以便到会场去买，选择的一个，很不像日本货，便花了一角五分买了，买了之后我问他们‘这不是日本货吧？’，那个人的回答说‘一点不假这是日本货’，后来我气得投入米什根湖中，因为这件事米什根大学的中国学生说‘胡适大买日本货’。”